



其中並有得獎之作，<sup>1</sup> 是一位具有豐富實務經驗的譯者。身為（翻譯研究）文選家，他主編的《翻譯研究讀本》（*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2000年初版，2004年再版，2012年第三版〕）是同類選集中的佼佼者，為翻譯研究必備的教科書，自2000年以來三版問世，既見證了其重要性與市場性，也發揮了相當的啟蒙之功與影響。因此，他的近作《翻譯改變一切：理論與實踐》（*Translation Changes Everything: Theory and Practice*）引起國際學界關注，實屬必然。

相較於先前的兩本專論，本論文集的標題「翻譯改變一切」不免顯得有些龐大與模糊，卻宣示了韋努隄個人對於翻譯的堅強信念。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為全書一以貫之的「基本預設」是「翻譯帶有促成多重轉型的潛能」，而這些改變不僅涉及源始文本（source text）與源始文本的社會與文化處境，也涉及接受方的社會與文化處境（p. 10）。副標題則名副其實地宣告此書乃理論與實踐之作，絕非純理論者的夸夸之言，也迥異於一般譯者缺乏反思的經驗分享。全書收錄了作者2000至2012年的十四篇文章，除了第十三篇未曾發表之外，其餘各篇宣稱係依照於期刊和論文集發表的年代順序（p. 8，〈緒論〉則最後撰寫），細察之下就會發現最後一章〈朝向一種翻譯文化〉（“Toward a Translation Culture,” pp. 231-248）為例外，原發表於2011年，勾勒出他心目中的理想境界，置於書末頗有「千里來龍，至此結穴」之意，更顯示了作者的殷殷期盼。<sup>2</sup>

<sup>1</sup> 美籍義大利裔的韋努隄除了翻譯計畫數度得到美國代表性機構（如 the PEN American Center,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及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與義大利政府的獎助之外，他英譯法瑞斯的《愛德華·哈柏：詩集》（Ernest Farres, *Edward Hopper: Poems*）於2008年獲得費格思翻譯獎（the Robert Fagles Translation Prize）。

<sup>2</sup> 至於韋努隄在2012年4月28至29日由臺北語言訓練測驗中心（The Language Training and Testing Center）主辦的「譯者的養成」國際研討會（2012 LIT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Making of a Translator）所發表的專題演講“Genealogies of Translation Theory: Locke and Schleiermacher”（〈翻譯理論的系譜學：洛克和施萊爾瑪赫〉）可視為相關理念之延續。此文由劉素勳中譯，廖咸浩編修，收入《譯者養成面面觀》（*The Making of a Translator: Multiple Perspectives*）（廖咸浩、高天恩、林耀福編，2013，頁17-37）。

由於是發表於不同地方的論文結集，作者表明此書用意不在「依照各章順序建構一個前後一致的論證」，而是「各自嘗試發展出一套反覆出現的理論觀念，並且考量它們的實際應用」（p. 8），各文長短不一，從二十多頁的著名期刊與論文集論文到七頁的線上雜誌文章（〈書市中的翻譯〉，“Translations on the Book Market,” pp. 158-164）都有，不少地方出現論述重複之處，但也因此可看出作者的立論，重要之處反覆斯言。也因為論文集的特性，讀者固然可以依序閱讀，了解作者的觀念及其發展歷程，也可隨興之所至，不必拘泥於順序。換言之，本書比作者前兩本專書更為平易近人。

對於知悉韋努隄以往論點的讀者而言，本書既呈現了作者一向的關懷，也展現了新世紀以來的主張與軌跡，如揚棄先前仰賴的施萊瑪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與柏曼 (Antoine Berman)，多方借用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的觀點。讀者若先閱讀〈緒論〉（“Introduction,” pp. 1-10），當對全書宗旨有一扼要的認識，雖然不像書中若干兼具理論與實例的文章那麼生動有趣。各篇結構清晰，論點明確，文字流暢，作者在關鍵處加入恰適的理論以發揮闡明之功，不少地方佐以實例，甚至現身說法，分享個人切身經驗，包括翻譯得獎之作出版前遭到多方退稿的慘痛經驗 (pp. 225-226, 232-235)。至於一些文本的探討，大到文學傳統與文類的特色，中到一個英文原本在不同語文脈絡下的不同詮釋與翻譯，小到一個外國字詞的不同英譯，也讓人體認到身為譯者的韋努隄出入於脈絡 (context) 與文本 (text) 之間，藉由遣詞用字反映翻譯策略，並試圖以翻譯介入文化政治、改變現狀的用心。

凡此種種具現了作者多年浸淫於翻譯實務與理論研究的功力，成為其論述的特色，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與說服力，迥異於一般的譯論或譯評。而他筆下多所批評的英美文學翻譯與市場，以及美國大學裡翻譯研究的邊緣地位與翻譯教學的建制史，則來自多年的（痛苦）經驗與（切身）觀察，反倒成為激發其論述的動力，促使他勾勒出心目中的美好遠景。

綜言之，韋努隄認為盛行的翻譯研究、評論、教學與出版所採用的是「工具性的翻譯模式」(“an instrumental model of translation”)，即其所謂的「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這種模式與主義重視的是源始文本，基於本質論的思維，預設了原文中有「不變之處」(“invariant”)，要求在譯文中加以複製或轉移，以期製造出語意上、形式上與效應上的「對等」(“equivalence”)，並且傾向於馴化的翻譯策略，盡可能符合譯入語的風格與成規，強調譯文的流暢性、可讀性與透明性，卻忽視了翻譯過程中的物質性、文化條件、社會背景與歷史脈絡。結果不僅相關標準人言言殊，也欠缺理論的反思與譯者的自覺，並將譯文依附於原文之下，漠視譯者的角色與貢獻，造成譯者的隱沒，使得翻譯研究在學院中長久處於邊緣位置。這種現象以英美最為明顯，顯示其封閉、自大，強化了英文在國際上原本的霸權與宰制地位，對(文學)翻譯的研究、評論、編輯、出版與市場的影響既深且遠(pp. 69, 178-179, 210, 230, 244-245)。

為了解決此困境與多年積弊，韋努隄亟思代之以「詮釋性的翻譯模式」(“a hermeneutic model of translation”)。這種模式重視翻譯過程中的物質性、文化條件、社會背景與歷史脈絡，著重不同語文之間的結構差異與不同文學傳統之間的文化差異，將翻譯視為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的行為，強調譯者的能動性(agency)，譯文則為譯者銘寫其詮釋之所在(即譯文是譯者詮釋之後的書寫)。這種詮釋過程始於選擇要翻譯的文本，更涉及解讀與遣詞用字，而其詮釋與銘寫只是片面的、暫定的、開放的，有待讀者進一步詮釋。韋努隄特別推薦此一模式的「解釋力與實際運用」(p. 245)，因其捨棄錙銖必較於定義不明的對等，重視譯者的角色與功能，強調譯文的自主性與譯者的自省與思辯能力，並企盼在接受方的社會與文化中發揮「轉型的」(“transformative”)效應(pp. 169, 179, 210, 230, 244-245)。

以上主旨具體而微見於〈緒論〉的三個小標題：「放棄工具主義」、「恢復歷史、文本性與能動性」和「論述一種新取徑」(pp. 2, 5,

8)。韋努隄除了運用自己專長的翻譯史與翻譯論之外，對當代文學與文化理論爛熟的他，也借助不同理論家以延伸並強化其論點，尤其是解構批評家德希達，以其「銘寫」觀來說明源始文本在翻譯時得到引申 (p. 4)；以其對於翻譯的「物質性」(“materiality,” pp. 34-35) 與「可重複性」(“iterability,” pp. 169, 182) 的強調，挑明翻譯過程中的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並用於具體的譯文分析；也提及德希達對於不可譯性的認定 (p. 41) 以及「相關性」(“relevance,” pp. 59-60, 71, 76) 的看法。<sup>3</sup> 其他如借助符號學家皮爾斯 (C. S. Peirce) 有關「詮釋」(“interpretant”) 的觀念，以解釋促成翻譯與銘寫的現象 (p. 4)；挪用政治哲學家巴迪歐 (Alain Badiou) 有關「事件」(“event,” pp. 4, 184-185) 的觀念，以形塑新的翻譯倫理，主張翻譯可促成事件，帶來差異與改變；藉由社會學家布爾迪厄 (Pierre Bourdieu) 所指陳的學術界的「反智論」(“anti-intellectualism,” pp. 61-62)，來批評翻譯界對於理論的排斥與淪於印象式的評論，說明為何翻譯研究於英美學界長久遭到邊緣化，甚至相對於文化研究中之理論主義 (theoreticism) 以及盛行的語言取向的翻譯研究中之經驗主義 (empiricism)，而淪於「雙重邊緣化」的困境 (p. 69)。以上四者在韋努隄的論述中較為重要，其他引用歐美理論家之處所在多有，在在顯示了他對於當前文學與文化理論的掌握。

全書不乏精采的論述，但最吸引讀者以及平易近人之處很可能還是身為譯者的韋努隄現身說法，如〈翻譯德希達論翻譯：相關性與學科拒斥〉細訴從法語翻譯此文的動機、過程與效應；〈翻譯托迪：古代詩歌

<sup>3</sup> 有鑒於德希達在文化研究與翻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pp. 70-71)，韋努隄策略性地選擇翻譯了其演講〈何謂「相關的」翻譯？〉(“Qu’est-ce qu’une traduction ‘relevante’?”，英譯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發表於國際知名期刊《批評探索》(*Critical Inquiry*)，藉此介入英美主流批評論述，提升翻譯研究在學術界的地位，而此譯文也成為該刊第一篇有關翻譯研究的論文 (參閱本書〈翻譯德希達論翻譯：相關性與學科拒斥〉[“Translating Derrida on Translation: Relevance and Disciplinary Resistance”]，pp. 57-79)。

與現代讀者》(“Translating Jacopone da Todi: Archaic Poetries and Modern Audiences,” pp. 80-95) 說明藉由重新英譯十三世紀義大利詩人托迪之作，表達自己的翻譯理念與實作（大膽結合了都鐸王朝詩人斯克敦〔John Skelton, 1463-1529〕的風格與當代的饒舌音樂，並模仿原詩的節奏與押韻），文末以雙語對照的方式呈現兩首詩供讀者參考；〈三重翻譯：英譯法瑞斯的《愛德華·哈柏》〉(“Translation Trebled: Ernest Farres’s *Edward Hopper* in English,” pp. 209-230) 娓娓道出如何英譯加泰隆語詩人法瑞斯根據美國畫家哈柏的畫作而寫出的詩作，其中不僅涉及語際翻譯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也涉及符際翻譯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與源遠流長的以文傳像 (ekphrasis) 的傳統。

其他多篇也各有可觀之處，如〈翻譯研究與世界文學〉(“Translation Studies and World Literature,” pp. 193-208) 介入晚近風行的世界文學研究，強調翻譯文學於世界文學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並以「細讀／近讀」(“close reading”) 來補莫瑞提 (Franco Moretti) 所提倡的「遙讀」(“distant reading”) 之不足。又如討論重譯的〈重譯：價值的創造〉(“Retranslations: The Creation of Value,” pp. 96-108)，討論英美市場與翻譯現象的〈書市中的翻譯〉(pp. 158-164)，以及討論翻譯教學的〈如何閱讀翻譯〉(“How to Read a Translation,” pp. 109-115) 與〈翻譯教學〉(“Teaching in Translation,” pp. 165-172)，都分享了他個人多年的經驗與心得，讓人感受到譯者與翻譯在英美世界中的弱勢處境，為其論述提供了鮮活生動的例證。由上述可知此書內容豐富，兼俱理論、批評與實務，值得有意深入翻譯研究者細品翫味，應可得到不少啟發與借鑒。

近年來翻譯研究成為臺灣外文學門的顯學之一，從華文世界的文化脈絡與發言位置閱讀此書自有不同的領會。首先，韋努隄固然反對英美主流的翻譯論述與現況，努力提供另類的批判觀點，但由他的語言訓練、文學背景、翻譯經驗與理論論述可知，所呈現的依然是西方中心的觀點，書中提到的非西方人僅限於林紓、嚴復、魯迅等人，相關資料來

自包括李歐梵在內的學者的論述，而非第一手資料的閱讀與體認，索引中將魯迅以斜體排印（“*Lu Xun*,” p. 267），顯然將人名誤為書名。<sup>4</sup>換言之，韋努隄雖已稍能打破全然漠視東方的現象，但套用他所挪用的拉岡（Jacques Lacan）的論述（pp. 40-41），此中仍存在著很大的「欠缺」（“lack”），形成亟欲彌補的「欲望」，對於本質上就著重於不同語言與文化之間溝通的翻譯而言，更是華文世界雙語學者可以積極介入之處。張佩瑤譯注的《中國翻譯話語英譯選集（上冊）：從最早期到佛典翻譯》（Martha P. Y. Cheung,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Volume One: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Buddhist Project*, 2006）之所以受到國際重視，正因為她以中英雙語與雙文化的利基出發，填補了全球翻譯史與翻譯論長久以來的欠缺，只可惜她英年早逝，至盼後繼有人。

其次，韋努隄重視翻譯涉及的文化條件、社會背景與歷史脈絡，強調翻譯過程中的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而在他的自述或對他人譯作的評論中，明顯看出他對於源始文本與翻譯文本各自脈絡的重視，尤其是接受方的歷史與文化脈絡對於譯本產生的關鍵作用。筆者於2007年出版的專書即以「翻譯與脈絡」為名，〈前言〉並拈出「雙重脈絡化」（“dual contextualization”）一詞，以強調在翻譯與評論時，源始文本與翻譯文本各自脈絡的重要性，首章就是〈譯者的角色〉，以示對譯者的重視與肯定，書中並分享從事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之《格理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的經驗與研究成果，與韋努隄的重點有不謀而合之處。此外，晚近華文世界對於翻譯史的重視有增無減，如香港中文大學王宏志主編的《翻譯史研究》年刊與翻譯史研究論叢，我國學者李爽學、賴慈芸、陳宏淑等人的翻譯史研究也迭有佳績，顯示這確是可行之路。

至於韋努隄提到譯者的地位不為學界與社會所重視，似乎中外長久

<sup>4</sup> 這種西方中心的現象也具現於他主編的《翻譯研究讀本》或其他西方學者主編的翻譯教科書及主流翻譯論述。

以來皆然，然而臺灣在國科會／科技部經典譯注計畫的推動下，十餘年來已有逾六十部不同語文原作的中譯問世，配合全國系列講座活動與媒體報導，由譯者現身說法，致力於知識普及。其他如國家教育研究院編譯發展中心（原國立編譯館）、文化部與臺灣文學館各提供部分資源進行翻譯計畫——尤其是中書外譯——雖然還有相當大的成長空間，但至少已有一定的制度與規模。<sup>5</sup>

韋努隄所批評的英美主流的歸化翻譯策略，也是臺灣的學界、市場機制與翻譯競賽主要採用的模式，表相雖然相同，但脈絡顯然有異。韋努隄批判的英美行之久遠的翻譯策略有其特定的情境，大至英文在全球的霸權與宰制地位，中至英美學術界與出版界的歷史背景（書中有關美國大學翻譯工作坊的描述就是具體而微的建制史〔pp. 240-243〕），小至各別學者、譯評者的評論以及出版社、編輯的實際作為。流風所及發展出英文中心的 (Anglocentric) 態勢，譯作在書市的比例奇低 (pp. 158, 173, 231)，而且歸化的翻譯策略旨在使譯文易讀，抹煞翻譯中的異質成分，使得譯文宛如透明，造成譯者的隱沒、地位低落。這種以譯入語為中心的現象也見於臺灣，並習以為常，如出版社要求譯文通暢，外文編輯的職責之一就是「順稿」。不僅如此，證諸魯迅的硬譯之流傳與影響有限，今日世界出版社採用歸化手法的譯叢風行，以及如思果的翻譯論著長久不衰，足證這種理念與作法已深入人心。類似韋努隄那樣長篇大論自己的翻譯策略與理念，就一般商業出版社而言可能是無法容許的奢侈（即便韋努隄本人也是另外撰文），恐非短時間就可改變，形成韋努隄所嚮往的翻譯文化。然而個別譯者仍可從韋努隄的主張中得到啟發，積極與出版社協商，策略性運用，凸顯譯者的角色。就對翻譯有興趣的學者而言，其實這些譯者的論述正是經典譯注計畫的基本要求，宜善加

<sup>5</sup> 北京清華大學羅選民2014年11月12日於香港嶺南大學翻譯系的演講〈文化自覺與典籍英譯〉中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近年大力推動中書外譯，即使如此，根據2011年全國翻譯圖書統計數字，譯入與譯出的比例為85：15，形成嚴重失調，並喻其為「翻譯出版的文化逆差」。相形之下，臺灣在這方面的失調與逆差更為巨大。

運用，投入中譯經典作品，厚植華文文化資本。而韋努隄建議英美出版社尋求外國文化部與相關單位的資助與忠告 (p. 164)，也是彼此可進一步洽商的方式，宜在平等互惠的條件下進行。

然而此中涉及另一關鍵因素，即在譯者無意或無法長篇大論、詳加注解的情況下，如何判斷與原文不符之處究竟係譯者刻意採取的翻譯策略，還是翻譯錯誤，包括能力不足或粗心大意所犯的謬誤。就此而言，韋努隄似乎有訴諸權威或認證之嫌，亦即某譯者的相關背景知識與經驗豐富，若其譯文出現增刪或有別於原文之處，很可能是「別有深意」，讀者該善加揣摩，不宜逕自視為誤譯。在韋努隄現身說法的例證中，我們確實發現他的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體現了譯者的積極介入與強力詮釋，有些地方與原文字面或上下文意有所出入，譯文中無可避免有失有得。閱讀其論述自己的翻譯策略，當可看出良苦用心。但在缺乏如此的機會與附文本 (paratexts) 時，又如何僅以譯者的條件來論斷？是否造成另一種權力階層——資深／資淺，權威／非權威？以譯者的條件作為判準，會不會比對照原文、尋求「對等」的風險更大？更何況，在韋努隄本人的論述中也坦承自己確曾一時疏忽而誤譯，編輯不察而付梓，後為書評者指出 (p. 48)。換言之，韋努隄固然強調譯者的詮釋，但其詮釋與揮灑的空間有多大？如何分辨有意的策略與無意或無能的錯誤？如何避免讓這種信任（譯者條件說）或說法（翻譯策略）成為誤譯的藉口？或形成另一種的菁英主義？解決之道或許在於譯者積極爭取以附文本作為說明，出版社在合理範圍內允許、鼓勵、甚至要求譯者說明翻譯的動機與策略（為何及如何在此時此地翻譯此書），讀者與評論者以更開闊的胸襟來面對譯者的詮釋，進而加入自己的詮釋。

臺灣另一不同之處則是翻譯在市場上的重要地位。相較於英美書市譯作的低比例（只稍高於2% [p. 158]），臺灣的比例甚高，<sup>6</sup> 影響甚

<sup>6</sup> 根據國家圖書館的〈102年臺灣圖書出版現況及其趨勢分析〉，2013年「總計有5,117家（單位）出版社出版42,118種新書」（p. 1），其中「有9,211種圖書標示為翻譯圖書，占全部新書總種數21.9%……翻譯圖書的來源，主要來自日本的5,210種（占所有翻譯圖書56.6%），其次分別為美國的2,123種（占翻譯圖書23.1%），以及來自英國的512種（占5.56%）與韓國的624種（占6.8%）」（p. 8）。

大。一個明顯的例子便是鑒於譯作在年度書獎中屢屢得獎，擠壓到本土創作的空間，《中國時報》開卷書獎於2000年起將譯作另闢一類，分別給獎。<sup>7</sup> 在積極翻譯國外書籍的同時，如何兼顧本土的創作以及中書外譯，值得有心者思索與努力。此外，儘管臺灣多方翻譯外文作品，然而多為市場取向，翻譯對於文化扎根與象徵資本的增加，亦即翻譯在本地脈絡化的程度和效應，缺乏深入、系統性的研究，因此翻譯社會學(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成為另一有待填補的空缺。

韋努隄在書末對其憧憬的翻譯文化與其中的譯者有頗為具體的描繪，事關他多年的理論與實務，此處不嫌辭費迻譯如下，以便讀者細察：

如果我們活在我所想像的這種翻譯文化，譯者會強烈地同時學到如何翻譯以及如何評論翻譯。他們的評論所根據的知識將既是文學的、也是歷史的，既是理論的、也是批評的，既知道翻譯、也知道翻譯被生產與運用的領域。譯者將不僅能把自己的計畫置於與過往理論及實踐的關係，也評量那些計畫對當今讀者群的吸引力。他們將能與使用和依賴他們作品的眾多讀者群分享他們的知識，而他們的分享出於同樣眾多的形式：以學者為對象的有關翻譯理論和歷史的研究專書和文章，有關翻譯的評價報告來協助出版者，為大小期刊撰寫的有關翻譯小說和詩歌集的評論，為自己和他人的翻譯所撰寫的序言，有關他們的計畫和生涯的訪談，有關當前翻譯議題的部落格。(p. 248)

此處對於譯者的描繪頗有夫子自況的意味，也充滿了菁英主義的色

<sup>7</sup> 諷刺的是，譯者的地位並未因此提升，反而更形低落。賴慈芸在2014年11月12日致筆者的電郵中表示，「以前沒有把翻譯書獨立給獎的時候，每個獎項有兩個獎座，一座給作者或譯者，一座給出版社」，但獨立出來之後，只頒獎給出版社，彷彿譯者只是提供「技術服務」，認為此舉對譯者「很不友善」。

彩，一方面挑戰現況，卻與他在其他方面要求更民主、開放的訴求似有扞格之虞，畢竟如此理想的譯者並非多數，或許因此韋努隄本人也不諱言翻譯中具有烏托邦面向 (p. 28)。他更進一步指出：

只有在這種翻譯文化冒現之後，讀者才會學習如何把翻譯當成翻譯來欣賞，不把它們縮減為其源始文本，學術建制才會理解與珍惜翻譯實踐，視為既是一種創意的寫作形式，也是一種嚴謹的學術形式，而且由於這些發展，出版者才會看到財務上的收益，產生動機並支持繼續投資於翻譯。(p. 248)

韋努隄所想像的譯者與翻譯文化帶有濃厚的理想性，係根據多年理論與實踐所提出的願景，問題在於如何在相關的脈絡下落實，並評估其可能的效應。至於能否拋棄工具性的翻譯模式，全盤採納詮釋性的翻譯模式？在彰顯譯者的形貌與聲音，建立一種翻譯文化之後，是否即可解決當前的沉疴積弊，為翻譯的理論與實踐開拓出另一番風光？或者只是從作者與源始文本的一端擺盪到譯者與翻譯文本的另一端，衍生出新的現象與問題？凡此種種有待繼續思索與觀察。

2014年11月15日  
香港屯門嶺南大學

## 感謝詞

本文承蒙王宏志教授、賴慈芸教授、余淑慧博士過目並提供意見，羅選民教授提供資料，謹此致謝。

## 參考文獻

### 中文文獻

單德興（2013）。*翻譯與脈絡*（修訂版）。臺北：書林。

廖咸浩、高天恩、林耀福（編）（2013）。*譯者養成面面觀*。臺北：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 英文文獻

Cheung, M. P. Y. (Ed.). (2006).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Volume One: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Buddhist Project*. With annotations and commentary. Manchester, UK: St. Jerome.

Venuti, L. (2012, April). *Genealogies of translation theory: Locke and Schleiermacher*. Paper presented at 2012 LIT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Making of a Translator, Taipei, Taiwan.